

# 丁玲的最后37年

晚年的丁玲在回顾自己崎岖多变的漫长一生时，清醒地意识到了『自由』与『革命』的矛盾……就像梦珂和莎菲一样

秦林芳◎著



行滿識識導王苦個  
勉足；‘不蒙’沒  
勵于她名同：有有  
作給爭作，丁時了  
總金的家她玲也心也得  
結牌是意有與很的不也  
發得金識強其麻人會就  
言主牌，烈他木，壞是  
‘發’大的文：有，這  
丁獎而作創藝：時我樣  
玲或不家作界，很是，  
秘進是意意領，痛一不  
**丁玲的最后37年**

秦林芳◎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丁玲的最后 37 年 / 秦林芳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5.6

(“长廊与背影”书系)

ISBN 7-5034-1644-0

I. 丁... II. 秦... III. 丁玲 (1904~1986) —  
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2565 号

**责任编辑:** 于保政

**封面设计:** 80 零 · 小贾 + 苏磊

**出版发行:** 中国文史出版社

**社 址:**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**印 刷:**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**邮编:** 101402

**经 销:**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**开 本:**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**印 张:** 20.5 **字数:** 250 千字

**印 次:**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:** ISBN 7-5034-1644-0/K · 1118

**定 价:** 28.00 元

---

(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)



敬文东

20 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，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：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。知识分子是 20 世纪中国的标本，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 20 世纪的中国；分析知识分子，就是分析中国的 20 世纪。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，也正是这个理由，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 20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中国。

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，有作家、诗人、历史学家、翻译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有革命斗士、自由主义者、新儒家的代表，也有汉奸文人。他们的

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。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，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。但无论是辉煌历史、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，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，一切都将、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，属于中国的20世纪。

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，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，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，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，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、更聪明、更幸福、更踏实。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，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；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，21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20世纪，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。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，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，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，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，对错误的洗涤，对光荣的分辨。

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，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，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；实际上，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，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，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。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，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，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。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。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，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。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，这里边没有哀悼，没有凭吊，没有唁电，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；反抗遗忘、指向未来、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，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。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，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。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。事实上，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，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，遗忘都被击倒在地，内心考古学和本意的本意却悄然站立了。

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；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：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。西谚说，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。同样，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。因此，所谓的内心考古学，不过是发掘细节。在此，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，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。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。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，它也提供意义。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。在这里，所谓意义，是充满细节的意义；所谓细节，是充满意义的细节。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，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、诚恳和善意，当然还有深度。

感伤是没有用的，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，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需品。反思意味着乐观，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。没有这样的品质，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。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，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的眼前。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，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，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。在这套丛书中，忧患是乐观的忧患，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。因此，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，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。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。

2005年3月2日



|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   | 引 言 | 从两种传统中走来      |
| 27  | 第一章 | “做好一名小号兵”     |
| 72  | 第二章 | “要看见旁人看不见的东西” |
| 86  | 第三章 | 风暴袭来          |
| 129 | 第四章 | “风雪人间”        |
| 179 | 第五章 | “自由”的呼唤       |
| 220 | 第六章 | “政治”的梦魇       |
| 286 | 尾 声 |               |
| 289 | 附录一 | 丁玲生平年表        |
| 312 | 附录二 | 主要参考文献        |
| 315 | 后 记 |               |



## 从两种传统中走来

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，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，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，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。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“多余”，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，却也不能不感动，哪怕那在整体中，是很渺小的。<sup>①</sup>

——丁玲

### 1

作家丁玲迈进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槛时，刚刚45岁。为了更好地讲述丁玲建国后的复杂生涯，我们不妨就她建国前的经历和心路历程，稍微唠叨一番。

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，丁玲也是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。1946年5月，在为《时代青年》写的一篇文章中，丁玲说：“我虽没有参加到‘五四’，没赶得上，但‘五四’运

---

<sup>①</sup>丁玲：《风雨中忆萧红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5卷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35页。以下所引《丁玲全集》各卷，版本均同此，不再另注。



动却影响了我，我在‘五四’浪潮极后边，它震动了我，把我带向前边。”<sup>①</sup>

事情确如丁玲所说，“五四”运动爆发那年，作为少女的她，正在湖南桃源、长沙等地求学。她不但积极参加了游行、讲演、剪辫子等学生运动，在思想上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丁玲是这样谈到五四运动对她的影响的：

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、要科学、要民主、要自由、要解放的呼声和潮流，猛烈地激荡着我们，使我们如饥似渴地去找北京和上海出版的各种报章杂志来读，想从里面找到中国应该走的道路。<sup>②</sup>

可能正是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感召，性情激昂的丁玲于1922年入上海平民女子学校，1923年就学于上海大学中文系，1924年到了北京。到北京那年，她才仅仅20岁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丁玲热心向西方学习。其影响所及，不仅在她的文学创作，更在她的思想。这正如她在给自己小说的英文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所说：

如果没有西方文学对我的影响，我大概不会写小说，至少不会写像这个译本中的小说。可以看出，我最早的小说是跟着西方现实主义的道路走的，不只在形式上是如此，就是思想上，也是受了一些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。<sup>③</sup>

①丁玲：《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5卷，第265页

②丁玲：《解答三个问题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8卷，第52页。

③丁玲：《为英文版〈丁玲短篇小说选〉写的前言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9卷，第215页。

1927年12月和1928年2月,20出头的丁玲,就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处女作《梦珂》和成名作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,至1929年上半年,又作小说10余篇,收入《在黑暗中》(1928年)、《自杀日记》(1929年)、《一个女人》(1930年)等三个集子中。在此期间,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冰心、庐隐等人的创作,处在相对停滞的状态。在不到一年时间里,丁玲描写女性生活的《梦珂》、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、《暑假中》和《阿毛姑娘》等,连续在权威的《小说月报》上刊载,确实给2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。

关于这段时间的创作,丁玲分别在1932年、1933年间有过说明:“在开始……对于社会上的一切,或某一件事,有一个意见,就想写出来发表给大众……同时我当初并不是以批判的观点写,只是内心有一个冲动,一种愿望,想写出怎样一篇东西而已”,丁玲声称,她始终是自己感受和冲动的奴隶,“总是先写一个头,搁下,后来再受了感触,觉得非写不可,于是再写下去”<sup>①</sup>;“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?我以为是因寂寞,对社会不满,自己生活无出路,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,却找不到人听,很想做些事,又找不到机会,于是便提起了笔,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。因为我那时是一个很会发牢骚的人,所以《在黑暗中》,不觉的染上一层感伤。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,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。”<sup>②</sup>

应该说,这些话,很准确也很诚实地道出了丁玲早期创作的基本特色。

为了了解丁玲其后跌宕起伏的生活,我们不妨就她的小说多说几句。

处女作《梦珂》的女主人公,本来是一正直、善良、有同情心的

①丁玲:《我的创作经验》,《丁玲全集》第7卷,第11页。

②丁玲:《我的创作生活》,《丁玲全集》第7卷,第15—16页。

女孩，但与一些卑鄙之人接触后，她发现了人心的险恶。于是，她渐渐地变了，为了能生存下去，她也不再反抗了，从此走上了“犬儒主义”的道路。在小说中，丁玲对梦珂以充满同情的口吻写道：“以后，依样是隐忍的，继续到这纯肉感的社会里去，那奇怪的情景，见惯了，慢慢的可以不怕，可以从容，使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，更加伟大，能使她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了。”

沿着《梦珂》的情思轨迹，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成为丁玲早期同类作品的代表作。在小说中，莎菲背叛封建礼教，大胆走出家门，对个性解放有着无限憧憬和追求。她渴望纯真的爱情，要求“享有我生的一切”。但是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气压下，她对人生意义的执著寻求，只能导致幻灭。尽管在建国后，面对如潮的声讨，丁玲坚决不承认“莎菲就是丁玲”、“丁玲就是莎菲”，但在莎菲和梦珂身上，早期丁玲的影子难道一点都没有吗？

晚年丁玲在回顾自己崎岖多变的漫长一生时，清醒地意识到了“自由”与“革命”的矛盾，并坦率地承认，自己在走向革命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，对“自由”曾有过深情的憧憬和深切的迷恋，就像梦珂和莎菲一样：

我原是一个贫穷的孤女……封建的黑暗生活常常要烙着我。我又读过一些古书，熟悉一些古人。因此忠烈爱国、慷慨激昂，孤高自赏，感伤忧郁各种矛盾注满我的心灵。有许多是催使我走向革命，然而又有许多是不合乎革命所须要的。比如自由。我个人一直是认为要自由思想，自由行动。“我怎样飞向了自由天地？”……当我在平民女校时，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入团，在上大也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入团。我都表

示了我的意见：我怕不自由。而当有人说：“你就按你喜欢的去学、去干、去飞吧，飞得越高越好，越远越好，你是一个须要展翅高飞的鸟儿。”我引为知己，并且就照着这样办，冲击了好几年……<sup>①</sup>

这里说的“有人”显然是指瞿秋白。瞿秋白曾经是丁玲在上海大学的老师，他们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交往。从丁玲的口吻听上去，瞿秋白的话正中丁玲的下怀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按照丁玲的话说，当时她最不想要的，“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”，她甚至不无极端地把党的纪律比作“一个紧箍咒”。她觉得，“要服从铁的纪律，命令我干一件事，就非干不可，要我去做机器里面的一颗螺丝钉，放到哪里就在哪里，我心里自问，这个太不自由，这个不行”。于是，她拿起了笔。虽然“拿笔也不一定行，但我可以自由”<sup>②</sup>。应该说，丁玲对自己的叙述颇为诚实，既不隐讳，也不避嫌。

1929年下半年至1933年5月被国民党逮捕前，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开始发生变化：她迈出了走向革命的第一步。这“第一步”的标志，就是长篇小说《韦护》的创作和发表。这部作品以“五卅”运动前的社会现实为背景，描写了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与革命者韦护的恋爱与冲突。韦护曾为爱人丽嘉而忽略革命工作，后在同志的“帮助”与粗暴的干预下，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便离开深爱着他的丽嘉，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了。

顺便说一句，不少人认为，《韦护》的主人公的原型，就是丁玲的老师、革命烈士瞿秋白。

接下来的丁玲似乎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。1931年秋，她在《北

①丁玲：《随感四则（四）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9卷，第436页。

②丁玲：《我是人民的儿女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8卷，第306、307页。

斗》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《水》。这篇小说以当年发生的16省大水灾为题材，描写了农民与水灾、官府作殊死搏斗的情景，场面壮阔，笔触粗犷，凸现了觉醒、抗争的农民群像，显示了“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”<sup>①</sup>。作品发表后，得到了左翼理论家的热情肯定。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向丁玲张开了怀抱。其后的经历可以证明，正是这篇《水》，标志着丁玲创作的明显转变，也显示了她在1949年以后，将有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。这当然是后话。

尽管如此，丁玲并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，更没有投身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去。那时的丁玲仍然固执地认为，“自由地写作，比跑到一个集体里面去，更好一些。我们并没有想着要参加什么，要回到上海。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，仍然寂寞地在写文章”。<sup>②</sup>

1930年5月，从济南回到上海的丁玲和胡也频，经潘汉年介绍，共同参加了左联。关于此事，丁玲回忆说：“5月从山东回来，和潘汉年聊了一阵天，喝了阵咖啡，就参加了左联。但因有小孩，不愿意活动。”<sup>③</sup>看得出，丁玲参加左联的方式既显随意，也不那么热情；后又以怀孕为由，不愿意参加左联的活动。因此，参加左联的实际意义并不彰显。

1931年2月，与丁玲同居数年的胡也频，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。这件事使丁玲彻底懂得了什么是“专制”，什么是“残暴”。她痛切地感到了在专制的淫威中个体的渺小和无力，而开始寄希望于“大家”、“集体”。

1931年5月28日，丁玲在中国公学发表讲演，希望死人的意志化

①冯雪峰：《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——评丁玲的〈水〉》，《北斗》第2卷第1期，1932年。

②丁玲：《我与雪峰的交往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6卷，第268页。

③见王景山：《我所知道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和所长丁玲》“附录一”，“我日记里丁玲的几次讲话”。

为“大家”的努力。她颇有感情地对前来听讲的学生们说：

有人说：死去了一个朋友，仿佛丁玲应该努力；也有人对我有善意的勉励。但死人的意志，只在一个人身上吗？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？<sup>①</sup>

在演讲中，丁玲扬起倔犟的头，极力否定了关于她的一些谣传。她说，所谓“丁玲终日以泪洗面，扶孤返湘”的孤苦，实际上“是错误的，是一种模糊的印象”<sup>②</sup>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现在找到了集体，也融入了集体，再不是从前那个单枪匹马的弱女子了。

看起来丁玲的变化相当快。梦珂和莎菲的时代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接下来，丁玲迈向革命的步伐更大了：

胡也频牺牲后不久，丁玲就向左联提出去苏区工作的请求，

1931年9月，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，留沪编辑左联机关刊物《北斗》；

1932年3月，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入党宣誓仪式由潘梓年主持，瞿秋白代表上级党组织参加。丁玲面对党旗庄严宣誓：“再也不做党的同路人了。我愿意做一颗螺丝钉，把我放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，叫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我的生命，我的心，不是属于我自己的，而是属于党的。”<sup>③</sup>

就这样，丁玲在思想上急剧地完成了“左转”，投身到革命和集体

①丁玲：《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？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7卷，第6、7页。

②丁玲：《我的自白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7卷，第1页。

③丁玲：《我是人民的儿女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8卷，第309页。

的行列，飞进了“集体”的怀抱。当年曾劝她“飞得越高越好，越远越好”的瞿秋白，如今又多了一个同志。

1933年5月，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，被押解南京，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多的幽囚岁月。这段痛苦的经历将在几十年后，给她带来更多的麻烦。当然，这又是后话了。

1936年9月丁玲出狱并逃离了南京，经过一系列惊险历程，终于在11月到达陕北。1937年8月至1938年底，她出任西北战地服务团（简称“西战团”）主任，率团开赴抗日前线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。在西战团活动期间，丁玲一反常态，积极提倡“个人”服从“集体”、“自由”服从“纪律”。

在《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》一文所附的日记中，丁玲写道：“领导是集体的，不是个人的，所以不是一个两个英雄能做成什么大事的”；个人“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”<sup>①</sup>。在西战团第一次大会讨论通过的《本团规约》中，头两条即为：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、“对上级应有礼节”<sup>②</sup>。看起来，为了革命，牺牲个人自由是必要的，更是值得的。这样的章程出于丁玲主持的会议，太有意思了。

丁玲在1938年夏天写的一篇文章里，对此说得相当分明：

为了人类幸福的前途，是须要大多数人牺牲了个人自由，耐心的，诚恳的不被流俗所喝采，也不以困难委屈而气馁的去工作，这些人也许不会出名，但他的伟大却将因世界的进化而永存在人心中。<sup>③</sup>

①丁玲：《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5卷，第48页。

②丁玲：《第一次大会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5卷，第50页。

③丁玲：《反与正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7卷，第38页。

早在1937年冬天，丁玲就写了一篇散文，题作《一次欢送会》，生动描写了集体对“个人自由主义者”王淇的批评、帮助，具体展示了“集体”、“纪律”对个体的约束力。从丁玲的文章看来，那个叫王淇的“个人自由主义者”读过不少社会科学书籍。据丁玲说，几次思想工作下来，该王淇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好印象，反而常常和大家意见不合，热衷于发表一些“空洞的、不正确的意见”。于是，王淇成了大家批评帮助的对象。在小组会和全团生活检讨会上，同志们多次帮助他，丁玲也同他谈过话，还批评王淇“过于原谅自己，应该同自己做斗争；斗争是不宽容的，残酷的，不停止的，到最后一天还会有”。据丁玲分析，王淇思想中的“主要成分是虚无，是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”，这在“我们如此紧张、团结的集体之中”，是不能容许的，因此必须鼓励他，但更重要的是纠正他。有意思的是，王淇的一些“奇谈怪论”，比如“国共合作是暂时的”等，后来却被证明正确无比。当然这还是后话。现在还是看看丁玲笔下的王淇。

该人经过多次批评帮助后，思想终于开窍，并表示“要记住你们给我同志式的爱护”。事情就这样得到了喜剧性的结局。<sup>①</sup>稍后，丁玲在《忆天山》一文中，还意犹未尽地提出，要“在集体中受磨炼，克服自己”，并慨叹这“真是不容易的事呵！”<sup>②</sup>无疑，这又是在自伤身世了。

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，在走向“革命”的征途中，丁玲又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。丁玲回忆说，“那年整风开始不久，我们天天学习文件，批判个人英雄主义”<sup>③</sup>。她也因为此前所作的《我

①丁玲：《一次欢送会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5卷，第80—84页。

②丁玲：《忆天山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5卷，第87页。

③丁玲：《序〈丁玲戏剧集〉——我与戏剧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9卷，第158页。



们需要杂文》、《“三八”节有感》等文章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严厉批评。但丁玲自觉地、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当中，以力求脱胎换骨。

据丁玲的丈夫陈明回忆，丁玲在整风运动时期，写下了两本学习心得，一本题为《脱胎换骨》，另一本题为《革面洗心》。<sup>①</sup>单从题目中，就可以看出运动对她触动之深，她自我改造的决心之大。

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的次月，丁玲又写了一篇题作《关于立场问题我见》的文章，表明了彻底改变自己、缴纳“自己的甲冑”的决心，算是对“讲话”的回应。她痛心疾首地说：

改造，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。既然是一个投降者，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个阶级来，就必须信任、看重新的阶级，而把自己的甲冑缴纳，即使有等身的著作，也要视为无物，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……

到了这个当口，她或许是真正地觉悟了，似乎把个人自由抛到了九霄云外：

与其欣赏那些，赞美那些个人的伟大，还不如歌颂那些群众的平凡的事业。这才是真正的伟大。<sup>②</sup>

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在表明自我改造的决心的同时，丁玲还反戈一击，对原先引为思想同道者的王实味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。在“批王”大会上，丁玲声色俱厉地说：“王实味的思想问题，从这个座

<sup>①</sup>陈明：《丁玲在延安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93年第2期。

<sup>②</sup>丁玲：《关于立场问题我见》，《丁玲全集》第7卷，第69页。